

时,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形象的主体或其所有者是谁?形象本身能否有所积累?主体性的积累作用到底取决于哪些因素?

从这样的问题意识脉络切入,“华人”(Chinese)的位置相对于全球层次意义上的“国家”与“阶级”而言,其实是非常需要分析的。“非典”(SARS)危机所透露的讯息正在此:一时之间,瘟疫的爆发让全世界的“华人”这样一个很暧昧的范畴,突然变成“反恐”时代,紧跟着“阿拉伯人”同样也很暧昧的范畴,变成全球上被认为可能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人口。在合众国(俗称美国)的“鼓励”之下,这些国家都开始监控穆斯林人的措施悄悄地变成了许多国家安全部门非正式的方针,甚至于已经成为跨国警察合作的主要对象。如此在全球的层次上,将“身份”与“国安”打上直接的等同号,让某种特定的社会身份成为警察监控的根据,进而影响特定人口的活动、财产与隐私等权益,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种全球性的种族“办法”正在逐步形成。从此开始,“安分守己”的实质内涵应该放在国家(包括逐渐形成中的全球超国家)试图收编“人类”的名义这个脉络来思考。在当前中国吸引了史无前例的资本大潮成为“世界工厂”之际,华人劳动力同时也变成了世界上最显著的移动人口。换言之,在“中华市场”的全球规模上,“国家”与“人民”的建构均有横跨诸如国际与国内移动、物质与非物质劳动、国族与诸众等一系列关键区分的界线。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脉络中,“诸众”的概念能否推动现况的分析,进而承担创造性主体的重任一事,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世人如何理解“华人”这个特殊的位置,以及“华人”怎么样去面对“形象决断”的挑战。

当然,早在19世纪末的时候,诸如梁启超、章炳麟等人关于“种战”(梁语)的论述早已涉及到了“形象决定”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在基因工程、物种濒临灭绝与各种生态变化等等趋势发展即将或早已登场之际,诸众的“种类”赌注绝不受限于“人类”这个本身相当暧昧的范畴。假设说诸众是一种切入“种类”知识论述的概念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将来“诸众的政治”就会勇于面对“人类”与“非人类”的界线,倒是值得注意的焦点。

灵活人格：一种新的文化批判

布莱安·赫姆斯**

李海霞译 苏哲安校

世纪之交的一系列事件,从西雅图到纽约,均表明了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不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除非我们要任由世界暴力大规模地提升。最初,这种批判随着“非正统”经济学^[1]的复兴而产生。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我们将逐渐迈向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凡是有效的文化批判,必须指出权力的主要关节和日常生活细微的审美要素之间的关系。除了揭露那些遮掩着不平等和赤裸暴力的特定话语、影像和情感态度之外,它必须同时揭示出社会关系的系统性,并呈现这些关系普遍被认为是必然的特征。为了冲破社会默认为的“平衡点”,它必须明确说明一个社会真正允许的是什么,以及该社会如何容忍其所不忍。这种批判通常难以实践的原因在于,它必须同时在两个相反的面向展开,一方面它所提出的观点一定要充分掌握错综复杂的社会过程才能说服那些专家,因为批判势力也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为了影响那些它声称要关注的人们,它所提出的结论又必须在

[1] 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1月首次在Porto Alegre举行,这是新古典主义或“供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事件。另外,我们可以从Joseph Stiglitz对其前雇主世界银行以及更重要的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古典主义政策下主要的跨国机构——的指控中窥见端倪。

* 此文最初是为2001年6月在维也纳Kunsterhaus由Boris Buden, Stefan Nowotn和the School for Theoretical Politics组织的The Cultural Touch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 布莱安·赫姆斯(Brian Holmes):旅法美国人。从事艺术评论与策展、时事评论与社会运动的工作,并为法国Multitudes期刊的编委。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拉丁语文所博士毕业。其部分著作均登录于http://ut.yl.io.or.at/site/index.html。

表达上深具吸引力——因为这些人的行为正是改革现状的依据。

这种批判不久前曾经流传于我们社会当中,它为1960和1970年代社会普遍而激烈的不满现象找出知性焦点,从而协助促使整个制度的改变。然而,它今天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审美向度不再是精神和客观社会结构之间可争辩的桥梁。而我们似乎也已经失去了否定性批判的兴趣,失去了建立一种反体制批判的野心。整个文化批判领域只剩下五花八门的英美式“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其实是一种肯定性的批评策略,一套追加价值而不是去掉价值的理论装置。然而,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却呼吁我们重新举起否定性以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

英国文化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兴起之日起,就通过将文学批评的复杂词汇转向工人阶级的实践与形式,以期颠覆美学上的既有阶级关系。他透过大众与精英文化彼此沾染的过程提升大众口语并改造精英文化,力图针对大众传媒所呈现的新的支配关系来创造积极的另类可能。在这个同时也改变着精英文化的交互运动中,大众表达的水准得到提高。这一方法大大扩大了大学里合法科目的范围,丰富了学院研究的风格,为改变大众教育理念做出了切实的贡献。^[2]进而,文化研究发展了一套战略意图,成为不折不扣的左翼知识分子“学派”。但是,它主要的理论工具却是鉴别接收法或者叫做“协商式阅读”法——以及信息的接受者所赋予的私人色彩。这种批评理论的初衷还是在阶级意识的模式^[3]之下揭示工人阶级对于支配性信息的不同解释。可在1980年代,接收的重点一旦从阶级的动态脱钩以降,文化研究沦为举出每一个个体或团体对全球化传媒产品的特殊贡献并加以赞赏不已。这样一来,它逐渐为一种新的跨国消费者意识形态建立了合法性。^[4]这种论述就等于是异化理论的圆满实现,将它收编并加以个体化、民族化,并占为己有。

今天的文化批判如何才能再度有效?我在此将探讨建立一种文化研究“理想模式”的可能,这种模式旨在揭示社会权力和个体道德戒律与情欲驱力之间的交互关系。^[5]我将其命名为:“灵活人格”(the flexible personality)。“灵活”一词直接暗示着当前的经济体系,诸如临时性劳动合同、即时性生产、信息化产品以及完全依赖于金融界虚拟货币的流通等等灵活性或弹性现象。但同时“灵活”也意味着一整套非常主动的形象,意味着自

发性、创造性、合作性、流动性、同侪关系对差异的认可以及对现实体验的坦诚布公。熟悉1960和1970年代叛逆文化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切恰恰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只不过它被一种新的霸权扭曲了形象。确实,我们都承担了巨大的历史使命来让当前社会的疯狂状态变得至少是可以勉强接受的样子了!

我将回溯二战结束之后这段不长的历史里,一种文化批判首先在知识领域进而在社会领域是如何获得有效的表达与接受的。同时我也将指出,目前的支配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之前的文化批判在面临当代资本主义收编之际无法演进而终告失败的后果而已。

一、质疑权威

战后文化批判的典范代表就是社会研究中心(Institut Sozialforschung)——即文明、自主的学术组织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基础可以被概括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何谓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呢?仔细研究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机构早在1936年就试图将其分析的重点围绕在研究权威形成的社会心理构成上。《权威与家庭研究》一文就是为了弥补“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解释无产阶级不愿主动承担其历史使命这一问题时的失败”。^[6]这种“不愿”——和工人阶级倾向拥护纳粹一样——只能通过探讨社会力量对精神的控制这一条路来理解。家庭中父权衰微、社会在儿童的人格形成中愈发重要等等现象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祖传世袭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亦即资产阶级老板直接操控家族资本)的瓦解一事直接相关。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将权力从私人手中转交给非个人的、有组织的公司法人。而对权威的卑恭臣服,据弗洛姆(Erich Fromm)的观点,也是与这种新的工业卡特尔(即企业财阀——译注)的机械化秩序分不开:他们将个体和有计划有组织的大众生产体系结合起来。“工具理性”的基本观念在这里就已经萌芽。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1941年写道:

那些指导人思考和行动的事实……在机械化过程中就表现为理性和合理化……机械化的大众生产将个体自我表现的空间占满了。^[7]

[2] 关于文化研究作为一项大众教育运动的短暂历史,以及之后其对此一初衷和可能性所作的更加理论化的探讨,参见 Raymond Williams: "The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Uses of Cultural Theory," both in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 Verso, 1989)。

[3] See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t. al.: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Routledge 1993, 1st edition 1975), esp. the "theoretical overview" of the volume, 9-74.

[4] The reversal becomes obvious with L.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an anthology that marks the large-scale export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to the American academic market.

[5] The methodological device of the ideal type was developed by Max Weber, particularly i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s we shall see, it was taken up as a polemical figure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the 1950s.

[6]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1st ed. 1973), P116.

[7] Herbert Marcuse: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A. Arato and 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Continuum, 1988), 143, 158.

该中心的早期著作结合了对权威主义教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和对工具理性的哲学分析。然而,即使如此强而有力的反体系批判,假设没有根植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据信那是针对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作的社会和政治性的回应)的研究上,也是终究无法成形的。中心成员帕洛克(Friedrich Pollock)和凯奇海莫尔(Otto Kirchheimer)是最先描述1930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人。^[8]他们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垄断资本的刻画并看出1929年经济危机实为一次辩证矛盾,进而指出了那之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显著转变:生产和分配不再像自由体制下由个体法人组成的市场竞争控制。新体制是经理层的资本主义,其生产和分配由政府实行中心计划和统一规划。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德国纳粹统治下的工业财阀上,而且还包括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甚至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的兴起。帕洛克写道:“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人与人之间是命令和被命令的关系。”^[9]或者,用凯奇海莫尔的话讲:“法西斯主义的阶段意味着:个人完全丧失独立性,而不同统治集团被国家承认为政治协商中唯一享有合法参与权的对象。”^[10]

通过中央计划实施全体动员战争以此来转嫁经济危机一事所透露的信息,诚如帕洛克所说的那样,表明“国家资本主义到底能否在民主监控下展开”这一问题,确实为“当务之急”的调查对象。这一调查在中心成员流亡美国期间进行了有效的实践,他们试图将对纳粹主义的分析转化到美国的冷战语境中来。其研究成果在今天仍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及以之为名的那篇文章;但当时更重要的作品是一项社会学研究成果:《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11]。这本书由霍克海默召集包括阿多诺在内的四人写作小组共同完成,它试图以社会学的统计方法应用到经验研究来指认法西斯的人格结构。通过问卷调查,证明一种“新人种”诞生了,其特征包括:僵硬的保守主义、对权威的屈服、反对任何个人主义的东西、墨守成规、强调权力和力量、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将潜意识情绪驱动投射到自我以外以及对性丑闻的过度关注。根据早期对权威研究的成果,他们指出这些特征与家庭结构有相互关系,家长力量的衰微导致其对孩子的支配权在事实上已经移交给了社会机构,而父权意识则更加夸张地膨胀。

《权威人格》是严格缜密的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旨在针对社会自我建立立场鲜明的形象,以期引导建构了多种多样的批评。而整合不同批判方法便是这一典范的重要功能,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问卷调查的统计学方法论意义。例如,阿多诺的修辞与美学策略,就只有在全力对抗权威人格的高度同质性时才能发挥效力。1961年,他在一篇关于“承诺”的文章中指出:

极右派报纸杂志经常煽动义愤情绪,反对那些不自然的、过于抽象的、病态的和颓废的:他们了解他们的读者。社会心理学对权威人格的洞见确实肯定了这点。这一人格类型的基本特征包括因循守旧、尊崇一套刻板的观念和社会体系、反对打破既有的秩序、反对唤起不被认可的潜意识元素。这一对任何异质或异己之物的敌对态度,要纳入任一流源的现实主义文学,即使是标榜批判性或社会主义的著作,比起被纳入那些宣称不忠于任何政治口号的作品反而来的更加容易,因为光是后者的形式便足以扰乱支撑着权威人格的整个僵硬坐标……^[12]

阿多诺着力探求的是布莱希特和萨特式的政治介入是如何渐渐被权威主义国家的不容置疑的秩序吞噬掉。正因此,贝克特和勋伯格那谜一般的、破碎的艺术形式,比起任何催促人们为了正义而团结的呼吁,在政治意义上反而更为彰显。这样,阿多诺迅速转向了对自我满足的个人主义的内在和谐的批判,以及对剥削体制的更为强势的整体化作用的批判。如此,他眼中的审美形式,因为拒不接受对真正矛盾的虚假解决而成了一股反抗力量。就像他曾打比方说的那样:

艺术的天职并非在指出其他选项,而是在单独利用形式本身来对抗世界的进程,因为这个进程永远只叫人坐以待毙。^[13]

在学术上探讨阿多诺究竟是如何得出这一“对抗的矛盾形式”的并不重要。更有意义的问题是看相关批判是如何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反抗运动的。最直接的例子来自马尔库塞,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曾畅销世界各国,尤其在法国。1968

[12] T. W. Adorno: "Commitment" (1962),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p. cit., P303.

[13] "Commitment", P304.

[8]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更常被用来指责苏联斯大林时期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和失败,例如 Tony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这一概念,将其应用到所有大萧条之后出现的中央计划经济政策。

[9] Friedrich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1941),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op. cit., P78.

[10] Otto Kirchheime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1941), in *ibid.*, P70.

[11] 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1950).

年5月的民主运动中,法国学生高举写着:“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标语。但这些仅能证明有着直接革命立场的马尔库塞可以成为一种象征,用以对各种权威国家、工业秩序以及大众媒体进行集中批判。在法国,萨特写过《被分期的人》(*serialized man*),卡斯多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发展了对官僚生产主义的批判。在美国,商业作家威特(William Whyte)早在1956年就对“组织人”(orgnaization man)提出过警告,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即将离任时谈到过“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危险。1957年,帕克德(Vance Packard)在《隐秘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中就将电视传媒视为主要的资本主义传播工具,之后,法国的巴特(Bathes)在其《神话学》(*Mythologies*)中发展了更激进的理论,一直到最后,德波(Debord)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问世。伊里奇(Ivan Illich)和古德曼(Paul Goodman)攻击教育制度是社会教条的中心,拉恩(R. D. Laing)和古特里(Felix Guattari)倡导反精神病学,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反都市化,而情势主义者的自我放逐(drive)对此加以实质的实践。而马尔库塞,在紧随1968年之后写作的文章《论解放》中,过早地预言大众超现实主义的爆发——他以为,超现实运动能够联合起美国被染上种族色彩的无产游民,并引发更广大的第三世界造反运动。

我无意将所有这些造反运动都直接关联于法兰克福学派。但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伟大的反抗”确实明确将矛头对准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对准他们指定的军队和工厂的规则,对准粉饰现实的文化工业的甜言蜜语,或许首先,对准了“权威人格”心理与存在论条件。右翼社会学家亨廷顿也这样认为,他将1960年代的造反运动描述为:“一场针对既存权威、公共和私人体系的总对抗。”^[14]但这只指出了表面现象。1970年代的美国风行一时的反文化口号是“质疑权威”。

我想指明的是这一相当有效的反体制运动的知识背景,尤其反对资产阶级生产主义对文化和主体性所产生的效应。用一句著名的法国涂鸦总结:On ne peut pas tomber amoureux d'une courbe de croissanc(生长曲线无法谈恋爱)。这句话出现在1968年5月的墙壁上,它的色情意味正表明了我还未涉及的一点,那就是反体制批判的积极内容:对平等和社会团体的渴望,对消除阶级差距的渴望。自我管理和直接民主是1968激进学

生运动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左翼意识形态中最危险的部分。^[15]诚如哈贝马斯在1973年写的那样:

市民在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实际参与,即,实质民主,可能引起他们自觉意识到,在政治领导下的社会化生产和剩余价值不断遭到榨取与使用之间存在着矛盾。^[16]

换言之,民主参与的持续高涨会迅速令人们看清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亨廷顿当时描述先进国家的社会“危机”时,用了“民主过剩”^[17]这个词,似乎也颇有相同之处。

这或许会让我们想起,亨廷顿这个评语原来刊登于1975年那臭名昭著的三边委员会的白皮书里(Trilateral Commission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集合北美、西欧与日本数百名意见领袖的私人组织。——译注),该白皮书专门评论在1960年代社会运动苏醒之际,发达社会愈发难以治理的趋势。而这个“难以治理”的前景恰好可以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居然能够在英格兰发动一场“保守党革命”^[18]做下注释。换言之,亨廷顿所谓的“民主紊乱症”是今天新自由主义霸权得以兴起的渊藪。而我的问题就是:后工业社会如何吸收了反对权威的造反运动中释放出来的“剩余民主”?或者,换个问法:1960年代如何最终暗中加强了人们对1990年代忍受度?

二、分化与收编

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富兰克(Thomas Frank)曾指出,我们“缺乏一个有关收编史的严肃研究,一个足以令人了解企业思维不仅是玩笑的研究”^[19]。在一本关于广告和时尚工业的历史书《酷的战胜》中,他追踪了从1960年代“另类”风格(hip)到1990年代“文化霸权”(hegemon)转变的历史机制,指出文化工业的基础已从过去的盲目守旧转变到大力倡导“正宗、个性、差异和反叛”等观念的工业。通过大量事例,他指出1960年代中产阶级弃守岗位的欲望后来都迅速被转化为商品化的影像和产品。富兰克没有简单将此解释成“被利用”,而是总结说相关的广告商和时尚设计师们对体制改革曾经抱有过存在论般的深度关怀。结果,“商业为了解释对民族生活行使支

[15] 用巴黎境遇主义分子(enragés)的话说:“议会权力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解除所有外部力量——直接和全民民主——真正的令行合一——议员可随时被选民废除——废除等级和专业独立——自觉管理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持续创造大众参与——跨国主义的扩张和协作。目前的要求不外乎这些。所谓自我管理亦不外乎这些。”From a May 30, 1968 communiqué, signed ENRAGÉS-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COUNCIL FOR MAINTAINING THE OCCUPATIONS, made available over the Internet by Ken Knabb at: www.slip.net/~knabb/Sl/May68docs.htm.

[16]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1st German edition 1973), P36.

[17]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op. cit., P113.

[18] The origins of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are described by Keith Dixon in an excellent book, *Les évangélistes du marché*, (Paris: Raisons d'agir, 1998).

[19] Thomas Frank: *The Conquest of Coo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8.

[14] M. Crozier, S. Huntington, J. Watanab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75), P74.

[20] Thomas Frank, *ibid.*, P229; the references to Harvey are on pp. 25 and 233.

配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改变——这变化,他顺便指出,也就是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灵活积累”。^[20]当然,在记载时尚被收编的过程之余,我们仍须作出解释的是诸如个人动机、意识形态合理化以及新经济体系下社会与科技的复杂功能等因素之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

对此,商业分析家皮埃尔和萨贝(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的一些观察可以当作出发点的线索,在他们的《第二次工业分化》(*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中提到了“管理危机”(regulation crisis)的概念,即“意识到现存的管理机构不能再保障生产和消费之间有效的互动”。^[21]他们分析了工业社会史上两次类似的危机,大致上与我们甚为熟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一致:“19世纪末,大公司的兴起;1930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兴起。”^[22]如今我们正经历第三次危机:它是1970年代经济萧条的延续,在1973年和1979年石油震荡中最为危急,十多年来一直并伴有区域性的劳工骚动。这次危机导致福特主义大众生产制度和福利政府的垮台,新一轮“工业分化”铺路。作者指出,这种趋势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工业发展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引起关注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工业分化开始了。表面看来最不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此时决定着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虽然工业家、工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并未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科技上的重大选择。但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却已经影响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结构的形式。工业分化于是成为后来调控危机(regulation crises)出现的背景事件。^[23]

根据他们对南部意大利的观察,该书作者描绘了一种被命名为“灵活专门化”的新型生产制度:“一种永不止息的创新机制:专为适应无休止的变化,而不是试图控制变化。”^[24]这一新体制作为对战后中央计划经济的背弃,以小型独立生产单位的形式存在,雇用技术熟练、设备功能完备的工作队伍,并与其他相关队伍适时合作,共同应对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耗费少,发展快。一切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早期行会的生产关系模式上去了,那时的工业分化导致了大型机器的发明和大众生产体系的建立。^[25]但不论在南部意大利北部还是其他地方,现实都更

为复杂。皮埃尔和萨贝在1984年还不能预见到主体和组织的重要性会比一套产品在主体性和组织上的重要性将会大多少:个人计算机和电子通信设备的产生使得此次工业分化与19世纪的大为不同^[26]。然而,他们关于管理危机和工业分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矛盾冲突——以及文化批判对此所产生的辅助作用——在改变管理形式和促进科技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社会冲突使得197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兴产业?这些矛盾如何影响到劳动力、管理和消费这三方面的体制变革?哪个社会团体与这一新的灵活性资本主义霸权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哪些阶层被拒绝或者残暴地排除在外?其间的暴力又如何被掩盖?

迄今为止,波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E·奇裴罗(Eve Chiapello)的《资本主义之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27]一书对这些问题作了最有意义的探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阶段或资本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必须通过至少是部分地结合或者“重组”前一时代的批判,以使非理性的资本积累冲动合理化,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再次趋于稳定——至少对制度的管理者是如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主要面临两大挑战:对剥削的批判,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社会批判”,历史上由工人运动提出;对异化的批判,或称为“艺术批判”。对于后者,他们认为那原本是一个小小的文艺事件,但现在随着福利国家中大学教育的普及反而变成更为重要的批判。波坦斯基和奇裴罗追踪了“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携手并进的1968学潮之后法国主要社会集团的命运。他们看到,工人团体中最高组织层获得了空前的经济利益,即便之后的生产机构逐渐重组,实行生产外移,以便远离工会控制和国家调控。而那些血气方刚的企管阶级,无论是尚未大学毕业或者已在企业中较低的阶层就业,他们成了对权威主义和官僚机构的非人性进行艺术批判的主要力量。波坦斯基和奇裴罗的主要观点是要表明,网络这个组织形象为1950和1960年代反体制的文化批判提供了一个灵丹式的答案——至少,对那些斗志昂扬的企管阶级,答案确实如此神奇。

这种网络化组织和生产有怎样的社会 and 美学吸引力呢?首

[26] 当然,皮埃尔和萨贝抓住了灵活性生产中编程工具的重要性(cf.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op. cit., 26-20)。概言之,他们认为:“计算机的魅力——像人种志研究中的归档——是使用者可以按照他或她本人的意愿和思维习惯来使用它。”(同上, P261),但是他们没能准确预见到这一技术到底能走多远,比如说,新的经济形势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机器的魅力。

[27]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 1999); for what follows, cf. esp. 208-285。两位作者采用韦伯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家类型“线上关系人”(connectionist man)。他们没有系统指出这一新型人类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他们的生产/消费模式,他们也没有抓住这一灵活类型在1968年崭露头角之初就呈现的骑墙态度,但是他们却很好的描绘了社会意识形态对骑墙派的压制。

[23]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5。

[2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5。

[25] 南部意大利的工业改革引起了文化和“制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这一经济形式脱离了全部的社会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继承了前现代的传统。这一定义十分诡异。就像 Antonio Negri 说的:“并非是怀念过去那种雇工模式,而是对老板设定的工作强度的反抗,对统一组织的反抗,才使得大量泰勒式工厂放弃了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它们先是采取双向雇佣,接着就是黑市劳力买卖,然后又倡导去中心化工作方式和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只有将‘拒绝工作’视做此次斗争的目的才能理解去中心化的劳动者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征。”M. Lazarrato, Y. Moulier-Boutang, A. Negri, G. Santilli; *Des entreprises pas comme les autres: Benetton en Italie et Le Sentier à Paris*, (Publisud, 1993), P46。

先,福特主义企业复杂的中间管理阶层被剔除,员工间随机建立起一对一的联系,这样,那种僵硬的权威阶序就解除了;第二,自发交流、自主创造和流动关系可以刺激网络成员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主动性,避免非人化和理性化的生产过程发生异化;第三,允许也鼓励更为灵活的工作形式:生产工具越来越小甚至纯粹是心理面的,电子通信渠道可以实现远端作业;第四,大工业生产体制下作为个人异化明显标志的产品标准也将被淡化,通过小型甚或微型生产网络,实行定做性产品的限量生产或者提供个人化服务;^[28]第五,欲望可以被激发,而快速被淘汰的新产品可以通过文化领域多媒体的编码效果产生,让员工和消费者分别所追求的意义空格同时获得填充,从而让福特式工厂那样生产结实耐用消费品而面临消费需求因而下降的问题获得局部性的解决。

总结出这些优点,我们似乎可以说网络化组织形式将传统上公司视为劳动力商品而力图购买的身份/财产(prorerty)——或者更确切地说,返还给了“专业级消费者”(prosumer)。有别于强制规训,这是内在化职业的新形式,它“呼唤”劳动者在/通过每一个工作项目主动实现自我,并由此规范和引导雇员的行为。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消失了,异化也似乎被克服了,因为个人都渴望将他们的工作和休闲结合起来。^[29]即使公司也开始从质化的角度看待工作,将它作为创造行为和自我实现的领域。“线上关系人”(Connectionist man)——或者用我的术语,“网络人”(the networker)——从直接的监管与瘫痪异化中解放出来,成为她或他优先赖以实现自我满足的活动之关键,只要这种行为可以满足个人继续留在网络当中的前提条件——亦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成有价值的经济交换。

显然,富兰克所描绘的那些新兴广告商和时尚设计师们在如此的社会阶序松绑的趋势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而网络共享具有的自主管理与自我拥有的特质同时还有个意识形态的重大优点:回应1968年5月提出的要求,它顺便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十全十美的合法性论证,将工人透过社会批判而得来的历史性优势——亦即集结于福利政府的那些沉重的、官僚化的、异化的、利润不断流失的结构体制,加以次第摧毁。由于同时收编了对异化的审美批判,网络化的企业文化可以使逐步驱除工人运动和破坏社会进程的行为合法化。这样——通过威廉斯所谓的

“选择性传统”^[30]——一种有倾向性的艺术批判话语作为新霸权的关键于1980年代早期由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首创,后在1990年代经克林顿政府完善并由布莱尔发挥到极致。

为了从1960、1970年代的逆流中恢复过来,资本主义必须更加灵活多样。比如采纳非正式劳动合同,选择“外移”(delocalized)生产场地,以逃避福利国家的调控管理,同时,利用分散全球的生产布局,一方面刺激消费欲望,一方面来重新赢得具有潜在革命倾向的经理和智识工人们的忠诚。这种双向运动激起新体系的建立,哈维将其称为“灵活积累”——它不仅意味着工作过程中新的结构和规则,而且还意味着个人化消费品的寿命短暂、迅速淘汰的特质,以及该体制所推动的更为善变的消费方式。^[31]在今天我们进行文化批评的时候应该记住,在这场由计算机带来的变革中,关键的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为高科技产品生产配件的血汗工厂。而个人计算机,由一个按照严格指令运作的计算器,用于社会之后才变成了一种图文处理机器:它工作效率高,为信息交流提供平台,并能独立地提供非物质商品以及色情和情感服务,这些都成了引领经济增长的新要素。^[32]

这样,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立刻就变成了工业和文化工具,在监管控制和激发创造力之间,它起到了调节平衡的作用,暂时解决了由艺术批判带来的文化危机。而人对移动自由的追求——可以理想化地描述为游牧主义与流浪的渴望——恰是这种调节有效的主要原因。便携式电脑为智识工人和有着游牧梦的经理人带来了肉体 and 想象两方面的自由,同时针对临时工人与分散的生产过程也提供了个不折不扣的便携式管理设备。它成功地缩小了个体和残余的官僚体制之间的距离,同时为个人打开了通往虚拟或“虚构”资本领域的通道——在这些金融市场里,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环境日趋恶化,但还是如变魔术一样神奇。这样,网络的组织典范所赋予的自主性可以成为新的生产规训,其中远程管理对社会关系的控制最为关键,因为可以永远支援双向的解释。理解了网络计算机这种深刻的两面性——即,它激发交流和创造的潜质已经成为新意识形态用以掩盖其远程控制功能的基础——也就理解了全球资本灵活积累制所推行的霸权性妥协的实质和脆弱。

地理驱逐和全球生产合作,即时性生产模式和仓储式运输体系,消费周期的总体加速和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光速向金融市

[28] 意大利南部设计师 Andrea Branzi 引导和理论化了这一转变,他区分了“纯种都市”(Homogeneous Metropolis)的大规模工业设计和他所谓的出生自古典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危机时刻的“杂种都市”(Hybrid Metropolis),后者找到了适宜的市场,自动化生产线,多样化批量生产,以及种族和文化上的少数民族。The Poetics of Balance; Interview with Andrea Branzi, in F. Burkhardt and C. Morozzi; Andrea Branzi, Paris: Editions Dis-Voir, undated, P45.

[29] 在 *L'individu incertain* (Paris: Hachette, 1999, 1st ed. 1995) 中,社会学家 Alain Ehrenberg 将战后消费体制描述为“一边是‘电视’屏幕前的消极观众,一边是以异化为主导的批判模式”。他继而将今天电脑终端的主动性内通视作“一种通讯模式,鼓励个体间的行为交流和关系交流,将自我实现作为主要的消费惯例”(240页)。注意在第二种模式中批判已经消失。

[30] 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出自 Raymond Williams; *When was Modernism?* (《现代主义始于何时?》),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op. cit.; 此文与其后一文代表了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审美异化史最深刻的思考。

[31]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141-148.

[32] 在 *Immaterial Labor* (《非物质劳动》)一文中, Maurizio Lazzarato 提出了“审美化生产”(aesthetic produc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通讯的形成过程及其以‘经济’为基础的特点。与‘物质的’生产模式不同,‘审美的’生产模式包括作者、复制和接受者……‘作者’必须放弃其个人尺度并参与到有组织的工业生产过程(劳动分工、投资、订购等)当中,‘复制’变成了以利益为最终驱动力的大众再生产过程,而听众(‘接受者’)则成为消费者/通讯者。”(*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44.) 计算机是作者功能导向型生产模式里最关键的工具,它保障了作者与大众之间持续的信息互动。

场的流入,以及与此相伴相生的全球媒体的急速膨胀:所有这一切都是19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灵活积累制的主要特征。哈维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将资本的跨国布局视作其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对抗之举,因为工人斗争曾经迫使单个国家在有限空间内对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断降低。皮埃尔和萨贝也曾作过相似的分析,他们认为在工业分化的时候,“表面看来最不相关的社会矛盾决定着技术发展”。但是他们仍没能够抓住他们所要描绘那一典型模式的全部暧昧性,而最早由波坦斯凯和齐裴罗对1960年代的抵抗运动中艺术和社会批判的分化分析中,我们就能理解灵活人格独特的美学性质和组织结构是如何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形成,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复兴——从1960年代的民主骚乱中。

三、在新的主权之下

我之所以关注197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复兴时期由计算机和远程通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形式的面向,是因为这些技术,以及它们的各项用途,在今天全球信息经济的兴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描述这种经济的最高形态时说:“新信息技术工业的产品将是信息生产设备或者是信息生产本身。”^[33]他进而指出,以多媒体形式进行再编码和生产的文化表现方式可以进入到数字化通讯不断增值的循环过程中。事实上,他认为,它们必须进入其中:“任何其他信息都将仅作为个人想象的表达或者注定成为不断被边缘化的面对面交流的亚文化形态。”^[34]但是卡斯特仅从基本的技术层面考察这一进入的状况,而忽视了技术本身也可以被其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模式所左右。他所了解的主体和集体的能动性,仅是对网络做出拒绝或接受的原始选择,随即在统治体系之内或之外寻求相对走得通的出路。这样一来,网络本身并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命运。任何系统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一批评路径是将计算机和远程通讯看作是在福柯所谓的“治理技术”(governmental technologies)这一更大框架之下的特殊、灵活的形式。福柯将管制技术(或更概括的讲,“管理性”)定义为“一整套建构、定义、组织和引导自由的个人走向交互主体的策略”^[35]。在此颇为关键的是控制程度的精确定义,一方

面还不到像身体被绑住那样权利关系完全被冻结的支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还是超出了福柯所理解的自由——即在上下关系总可逆转的情况下,每个个体在开放式的权利关系场域内都想要“管理他人的行为”——的范围。治理技术恰恰就存在于强度尚未达到直接支配的那一层:它们算是集体疏导更隐形的形式,适用于个人享有相当自由并倾向拒绝任何明显的强制性权威的民主社会。

很清楚,1970年代中期由亨廷顿、撒切尔以及其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所诋毁的“管制失灵”(ungovernability)问题只能通过一种方式找到它的“解决之道”,那就是引进一套新的治理技术,以稳定新的社会关系类型;如今考察这些新型关系是如何运作的正是当务之急。从管理的硬件说起,我们很清楚电子设备产生之后监视措施的飞速发展。在任何关卡——国境、出纳机、地铁票闸、医院挂号处、信用卡申请处、电子商务网页的架设——中,人的个体身份(甚至身体特征:指纹或手印、视网膜、DNA)被远程数据库记录并审核。这可谓直接有时甚至是独裁的控制。但是,正如里昂(David Lyon)所言:

每次监视范围扩大化的时候都会有人巧言支持,而不论你赞成与否,结果往往就是那些自己的数据或信息被系统掌控的人终究就会附和。^[36]

最有说服力的动因是人们需要不断增强安全感(从防止偷窃到避免攻击),而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提供的经营风险保障也需要个人信息以建立合约。所有这些论据和其他相关观念必将引发人们把监视的理由加以内化,主动为远方的监视人提供个人信息。当然,这里所举的监视过程中主动顺应的例子还仅仅是控制系统的冰山一角。更有力的例子是,政治上自我控制的稳固形式出现在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中——尤其当工人参与到文化信息的生产过程当中时。

不论在本地还是异地工作的薪资劳动者,在电子遥控技术连接各地的情况下,显然都会被监视到是否遵守规章制度(监视镜头、电话监听、键盘监测、员工电波识别证等等)。另一方面,自由职业者如果出现违规行为也可被轻易解雇,比如拒绝其产品,或者控制其发行渠道。内在化的自我监视变成了自由职

[33]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London: Blackwell, 1996, P 67.

[34]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P374.

[35] Michel Foucault: L'éthique du souci de soi comme pratique de la liberté, interview with H. Becker, R. Forner-Betancourt, A. Gomez-Muelter,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V, Paris: Gallimard, 1994, P 728; also see the excellent article by Maurizio Lazarrato: Du biopouvoir à la biopolitique, in *Multitudes* NO. 1, 45-57.

[36] David Lyon: *Surveillance Socie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4.

业者们生存的关键。文化生产者也并不例外,一定程度上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内在自我过活:除了最高水准的艺术,自我审查的微妙形式已经成为一条艺术生产的规则,至少在与市场直接打交道时是这样。^[37]但更深层也更有影响潜伏于文化、艺术和伦理那曾经以永恒为价值的理想之中,在参与到瞬息万变的资本主义价格和时尚的角斗之后,危害愈演愈烈。在文化经济的信息处理器中——包括媒体产生出的大量职业、设计和现场秀,以及通过各种形式拓展的诸如业务提供、咨询、诊治和教育等等——一种非政治化(depoliticizing)的犬儒主义比自我审查更加深入人心。维尔奴(Paolo Virno)这样描述道:

当前犬儒主义的基础是,男男女女通过经验规则而不是通过“事实”来学习。……然而,学习规则,同样意味着意识到该规则毫无根据的虚构性。我们不再依赖单一的事先规定好了的“游戏”,尽管我们曾经深信不疑地参与其中。如今我们面对的是数个不同的“游戏”,每一个都不是全然明了和严肃认真的,它们只提供直接的自我肯定的场所——这种肯定野蛮狂妄,玩世不恭,我们越是使用它,不抱幻想却抱有瞬间绝对的忠诚,我们就越能体会到那些变和不变的规则。^[38]

1979年,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曾指出,语言游戏渐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生产的舞台,它将获得知识的手段计算机化,原始的研究工作在此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独断语义领域变换叙述的“招数”(moves)。^[39]后现代经济的这一语言学转向,使得原本无解的马拉美的“roll of the dice”这样的隐喻符号变成一种有诱惑力的社会游戏,就像股市中的内线交易那样,所谓机会,不过是对真正操控规则者的无知而已。这里,犬儒主义既是游戏者无边的投机心理形成的原因,又是其先决条件。维尔奴评论道:“投机者面对的是可交互替换的可能性之流,尽可能的保持开放,不停地就近转换,盲目地摇摆不定”例如,“计算机,非但不是导向唯一结果的工具,反而是为作品提供一系列展览‘机会’的前提。投机者的价值体现在,无论何时当具体的劳动过程被无处不在的‘交往行为’侵占时,它可以变成一个不可缺少的资源……计算机化的交流需要‘有机会

的人’时刻准备着,等待着每一个机会的到来”。^[40]当然,真正的机会主义者满足于新语言游戏下任何新利益,包括政治上的。政治在流动性和市场联系瞬息万变的时代崩塌了。这也是维尔奴在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出反讽性解释时的意思。在哈贝马斯关于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中,他指出民主社会的认同最终来源于每一个公民坚信,一旦有所怀疑他就可能被一套更细致的论证所说服:“只有当行为动机不再通过尚需解释的规范,当人格系统不再在一个确定身份的解释系统中寻求认同上的同一性时,不加推理地接受既定结果才会变成常规,也就是说,绝对的顺从因此产生。”^[41]对1973年的哈贝马斯来说还是社会小说的虚构,对1990年代初的维尔奴来说却已经是社会现实了:人格系统毫无主体真理可言,对集体解释程序的安全性也不作要求。更糟糕的是,这一现实的基础被建立在意大利左派标榜劳动者的独立自主等诉求的严重扭曲之上。

我们的目的很清楚:用“灵活人格”来形容非物质化劳动者,形容“专业级消费者”,或者“网络工”,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形式,这次异化的对象并非1960年代所推崇的生命精力和游牧欲望,而是政治社会本身的异化。毕竟,从民主的角度说,政治并非有利可图之事,因此也无法被吸纳到想象和感情生产的循环当中。灵活人格是新的社会控制形成,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艺术对抗权威主义和标准程式的扭曲形式:一套用以“建构、定义、组织和疏导”1960年代西方社会革命能量的实践和技巧,那次革命一度被认为有能力改变社会关系。

要深刻理解这种灵活人格的概念,或者说,这种当代资本主义所塑造并疏导的主体性概念,可以将目光投向法国之外,投向野心勃勃的经理层之外,关注最初革命参与者中另一团体的命运,比如美国激进无产阶级产生了强有力的黑人解放力量,1960年代墨西哥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激发了其后大量认同团体运动,就会更加清楚。在此,真正威胁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出现了,所谓纳入和排挤的辩证也变得愈发明显和关键。然而,将认同建构纳入商品文化生产当作设计资源一旦被鼓励,认同的问题就会开始偏离真实的社会冲突。例如,近期文化研究更多关注娱乐传媒,采取缓和的话语方式,极力回避1990年代初美国大学的严重冲突,当时的运动试图将像“I, Rigoberta Menchú”这样的少数民族解放叙事纳入所谓的“文艺经典”之列。通过主

[37] For an analysis of the ways that (self-) censorship operat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oduction, see A. Corsani, M. Lazzarato, N. Negri; *Le Bassin du travail immatériel (BTI) dans le métropole parisien*, Paris: L'Harmattan, 1996, PP 71-78.

[38] Paolo Virno: *The Ambivalence of Disenchantment*,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op. cit., 17-18.

[39] Lyotard: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 Paris: Minuit, 1979, esp. 13-14 et 31-33.

[40] Paolo Virno: *The Ambivalence of Disenchantment*, op. cit., P17. Compare Sennet's discussion of a 1991 U. S. government report on the skills people need in a flexible economy: "in flexible forms of work, the players make up the rules as they go along ... past performance is no guide to present rewards; in each office 'game' you start over from the beginning." Richard Senne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8, P110.

[41]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op. cit., P44.

流商业媒体——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提供的庞大资源,区域性文化和亚文化被抽样、再编码为产品形式,进而出口转内销,通过比地方更为广阔而有利可图的世界市场来喂给原创作者。^[42]接受上的地区差异也被处处用来证明全球产品的开放性和普遍性。企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对大量非白种人也采取开放姿态,只要他们愿意遵行这种管理的游戏规则。这是跨国治理合法性的基本要求。但是一旦某一地方的认同形式发生问题,危及城市的、地区的或者地理政治的平衡——我在此特别指的是阿拉伯世界,同时也指巴尔干地区——那么,布登(Boris Buden)所谓的“文化诉求”就会显出完全不同的面目,所谓种族身份将不再是商业交易的筹码,而是一种原始“部落的”权威主义的标志,它可以被合法的加以镇压。

《帝国》总结了一条重要教训:不是避免,而是刺激和管理地区冲突成为跨国治理的奠基石。^[43]事实上,以一种持续低强度的国内战争的形式,美国自身已经处在此种管理模式之下了。易管理的、然而又激发武器消费的种族冲突就是资本主义帝国大厦运转的最好养料。而目前的恐怖主义恰好为政府提供了扩大监视功能的契机——而这是在绝大多数公民完全赞同的情况之下。

显然,现在我们的论述已经转换了范围——从社会心理层面转到了地理政治层面。但要正确落实理想模型,我们必须牢记活人格的各种演变其实都是发生在相当固定的政治、经济架构内。皮埃尔和萨贝指出,他们所谓的“灵活专门化”仅是对1970年代经济萧条和管理危机所作反应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旨在扩大大众生产的模式。它因此将生产厂商和发达国家市场与高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相连接。这主要得益于公司制度(现在已演变成跨国团体)的大力推广,公司取代早已管理无效的国家进行稳定市场的工作”。^[44]实际上,跨国公司,由金融市场引导,由七国政府的军事和法律制度保护,已经取代了之前的殖民—帝国主义秩序而掌握了世界经济大权。皮埃尔和萨贝所预言的“跨国凯恩斯主义”——一种通过调控机制来保障全球消费需求的制度——并没有出现,相反,保障掠夺性的投资,最大化持股人利益的制度却建立了起来,宏观经济调控在此仅为了缩小通货膨胀,保障免关税贸易,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权威人格时期作为权力根源的“军事—

工业复合体”已经被如今所谓“华尔街—财富复合体”所取代——“一群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谓的权力精英,一个由志趣相投的大腕们组成的特定圈子——他们占据着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45]

权力精英跨国结网一事究竟创造了怎样的劳动制度?2001年6月13日,媒体报道因计算机销量下降,美国康柏公司将削减其全球雇员的10%,惠普公司也将削减5%——这意味着分别有7000和4700个工人面临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高度自动化的戴尔公司却从其灵活多变的雇佣队伍中实现了竞争优势:“机器人还不够灵活,每一台计算机都将是独一无二的”,戴尔欧洲区总裁如是说。^[46]在其即时生产过程中,因为其厂房里没有老式的生产流水线,戴尔能够迅速摆脱由消费者带来的价格下跌困境。这样它将康柏从行业第一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迅速寻求更大的发展。“一切都将像波斯尼亚那样”,一位上层主管满意地说:“赚取那样的市场份额是一生难求的好运气。”

这种以剥削和驱逐为乐的残酷性格极富典型性——权作活人格所属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一个例证。^[47]但是,难道这就是我们从1960年代的权威批判中寻得的结论吗?

四、结 论

Yes Men(遵命好汉)行为艺术团体的煽动高手最近接受了芬兰坦佩雷“纺织业未来”论坛的邀请发表演说。假装为WTO代表,恩如(Hank Hardy Unruh)分别从历史和未来的不同角度指出,像美国国内战争那样的不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光靠市场规律就能保证南部采棉奴终获自由的演变。反正,假设在像今天的芬兰这样的国家要供养一个奴隶的吃、穿、住和安全的话,所需费用一定贵得离谱,根本就不如移到像加蓬那样的国家,吃、穿、住的花费本来就很低,更棒的是,既然那里的劳动力是自由的,那么治安的费用就几近为零。当然他也警告说,工厂外移早就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尝试过了:于是,他用微软PowerPoint软件在荧幕上显示出反抗英帝暴政的抗议画面。他说,为了阻止甘地式的工人起义——即手工纺纱和地区自足经济策略——再次抬头重现,WTO必须出台相应的纺织法规。

这时,一个助手突然上前把恩如先生身上的标准西装撕下,

[42] Jagdish Bhagwati: *The Capital Myth*,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8; electronic text available at www.asia-media.ucla.edu/Deadline/bhagwati.htm.

[43] Une crise sans précédent ébranle l'informatique mondiale, *Le Monde*, June 13, 2001, P18.

[44] 这种容忍最终的原因似乎是危险的。在 *Souffrance en France* (Paris: Seuil, 1998) 一书中,劳动心理学家 Christophe Dejours 研究了当代管理中“平庸的恶”的问题。除了首要关注这类极端异常和狂妄的萨德行径之外,他还分析指出:现代社会将对勇气和男人气的展示视作从事“肮脏工作”(选择易遭解雇的职业、绝对执行生产要求等等)的最高道义。“集体的辩论策略使得对‘肮脏工作’的否定具有了合法性……经济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除了男子气概的展示——任何情况下,以超越个人利益 (*supra-individual interests*) 为重”(109-111)。Dejours 发现,这一辩护机制的根本,既有对个人义务担忧,也有对自我牺牲的担忧 cf. 89-118.

[42] 文化研究的著作,像经典的 Dick Hebdige 的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如今已直接受市场专家的指导吗? Frank 和 Dave Mulcahey 给可能的股市投资者们虚构了一份“购买指南”:“整合‘异质公司’(Consolidated Deviance, Inc. [‘ConDev’]) 在伪造、咨询、批准和买卖异质亚文化实践中是毋庸置疑的民族领袖,即使不是唯一的。在其高成功率的‘SubCults(tm)’公司下,市场化了的青年文化运动迅速发生风格转变和跨媒介的大变革。ConDev 公司刺激了消费大众对边缘文化的兴趣。”(*Commodify Your Dissent*, Thomas Frank and Matt Weiland eds., New York: Norton, 1997, 73-77.)

[43] 参见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8-201: “The triple imperative of the Empire is incorporate, differentiate, manage.”

[44] 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op. cit., 16-17; cf. the section on “Multinational Keynesianism”, 252-257.

露出里面一身闪闪发光、金丝质的紧身衣,衣服的腹沟处安装有一条一码长的充气阴茎,它能突然勃起并奋力舞动,仿佛具有独立的生命。PowerPoint 的画面同时显示了一幅相似的动画影像,其中有一个烧包男子在热带海滩上身着相似的扮装:其正式名称为“管理休闲服装”。恩如先生解释说,当外移工厂运转顺利时,该套装将通过植入人体的芯片来传导愉悦的讯息。然而,芯片凸起末端安装有一个针孔摄影机,通过其中的遥控,管理人员可以随时获取进展不利的坏情报并进行干预,恩如继续解释说:“这套设备叫做‘职员观想义体’,搭在腰上、免持操作,安装快速、操作便利,通过这套设备,经理可以直接看到他的雇员并获取所有相关的信息。”^[48]此时台下有人鼓掌吹口哨,早已是哗然一片。

就是通过这样的荒谬绝伦表演,我们这个社会的认同典范,遵命好汉表演团体(the Yes Man),似乎已经俘获了现代监管和消费制度的方方面面。他们空前绝后的创作一针见血地抓住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这些现代经理,他们风格敏锐、深谙技术、渴望自由、快乐至上,他们的脉搏与信息流动息息相关,有能力也被迫对任何社会波动作出回应,同时他们尽享各自的人生——挥霍股票特权带来的利润,在工作和度假之间飞来飞去,指尖连接着无尽的欢愉和强大的科技控制权。直到第二天有报道将整个荒唐的会议捅了出来之前,企业界的听众们还以其标榜宽容的企业伦理表达着对纺织品的喜爱、对技术喜爱,当然也同样喜爱那个笑话。然而,当 PowerPoint 的屏幕上迅速闪现一群 15 岁的亚洲妇女在工厂里操劳,她们的孩子蹲在车床上这样的镜头之际,那些企业精英不知有没有感到畏缩?

* * *

灵活人格代表了当前治理的形式,这种内在化的、文化的“软”统治形式,其实完全可以与诸如劳动条件、官僚体系和警察行动、边疆体制台面下的迁徙与贸易,乃至军事干预等等事务实据直接联系。如今我们得以全窥这种心态——确切地说这种“文化的意识形态”^[49]——的主要特征,身为知识分子兼公民之我们揭竿而起的时刻确实来临了。对于理想模式的了解而作出贡献的统治形式之相关研究,即使有刻意夸大其词之处,也确实

构成了学院知识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反抗作出正面贡献的渠道之一。更主要的是,对“非物质”和“审美的”等生产现象作出批判一事,确实可以受惠于这次激进否定性批判的复兴。在统治体系和风格已形态毕现之际,对那些心仪法兰克福学派抑或我们这年代更接近的福柯的学者们,面对分析架构跟上时代的更新挑战,应该都是难以拒绝的当务之急。

然而很明显,仅对这种统治体系做出描述,即使是很精确而科学的,都不足以战胜它。而治理体制及其所有的细枝末节,非常容易变成学者无限内省的清谈对象,最好尽量避免。凡是批判理论都有及时性,而这种及时性的内涵便在于拒绝那种能够整合并抵消之前一定数量另类方案的高效而强势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也要避免重蹈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旧辙:当批判过于整体化之际,最终的出路仅剩一条诡辩的、冥想性的和精英化的美学之路。今天的批判必须保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实践性,参与交往行动,或确切地说,从事交往行动的社会运动:再造新的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文化,以期扳回预期中的收编命运。^[50]我们可以拿灵活人格的形象加以公开地嘲弄和讽刺,我们可以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击败它相关的支撑机构,我们可以透过文化与艺术创作来暴露它的特征,总之,我们不必将它的描述以及另类的追求当作又一次的学术工业而已——这样做仅是靠拢非物质生产的潜在轨迹——我们反而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次转机,可以打造知识分子的联结,为更美好的社会提供共同的计划。一旦瞄准社会改造,否定性批判本身就可以产生一股强大的主体性力量,通过共享参与,个人可以塑造并改变自身。^[51]

灵活人格并不是宿命。不管乡愿的意识有多大,也不管现代社会的监管结构有多严密,没什么能够阻止高级学府所代表的那种特殊时间性所产生出来的高深莫测的批判性知识,与街头上全新同时也复杂精密的反抗形式直接达成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批判”可以再次加入拒绝剥削的行列中来。在反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我们也确切看到了这种跨界批判的现象。^[52]反抗力量如今已经发展成一股势力,当然可以扩展到更广大的领域。经过个人计算机的引进,国家通讯的基础建设已获得了局部性的显现与透明化,大量的“知识资本”也已经从福利国家的教育机构转移到非物质劳动者的肉体和心理当中:这些资产本来就属于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冒着对于资本主义的

[50] 因此,会有人对政党或某一统一社会阶层所作的对抗性政治实践持矛盾的,但本质上却是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那是为稳任政权而努力。对此较好的分析文本是 Miguel Benasayag 和 Diego Sztulwark 的 *Du contre-pouvoir* (Paris: La Decouverte, 2000)。不无巧合的是,这本书也谈到了知识生产转型的可能性问题:“区别不在于是否像大学那样从属于国家结构,而在于我们要与那个生产、修订和分配知识的选择机制相合。这一点必须在‘少数’(也就是‘非同质的’)反权力场域内进行,逐渐地,它会参与到强有力的反权力集团的伟业当中。”(P113)

[51] 以民族为基础的新竞争理念强调自由和独立的主体间竞争,它更倾向于为社会关系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而放弃对传统权威的重建。Richard Sennet 在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op. cit., 115-116 中并不掩饰对后者的怀念,但他同时说,更有趣的是,在“对共同体的考察过程中……体现在当前对协商式民主的研究中……发现相比于断然宣布何为‘正确的’原则,不断增加的不满更能紧密地团结人民”(143-144)。

[52] For a glimpse into the way intellectuals, activists, workers, and artists can cooperate in dissenting actions, see Susan George, “Fixing or nixing the WTO,” 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2000, available at www.en.monde-diplomatique.fr/2000/01/07george.

[48] The story of the Yes Men is told by RtMark, Corporate Consult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at www.rtmark.com; or go directly to www.theyesmen.org/finland.

[49] The notion that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legitimates itself and renders itself desirable through a “culture-ideology” is developed by Leslie Sklair, in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London: Blackwell, 2001).

民主反抗和政治自主之险就可以占用。激进民主运动的历史资源还有待开发和挖掘,目前民主运动的目标和进程也有待辨析和公开探讨。

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但若不如此,我们就只能目瞪口呆地傻看着别人掷骰子——永远在假期和工作之间飞来飞去,眼睛盯着最新资讯,指端连接着操控盘。

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

莫利兹奥·拉札瓦多*

李洋译 苏哲安校

1

1970年代以来,福柯通过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天业已变得日益明显的话题:“生命”与“生物”成为新政治与新经济战略的筹码。他也同时为我们印证,“生命被纳入历史”(l'entrée de la vie dans l'histoire)一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

实际上,从18世纪以来,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的展布就已被纳入了“生命过程”以及控管与调节这些进程的可能性。“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命世界中生物种类的含义,其中包括诸如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寿命的几率、个人和集体的福祉等等现象,均为可受调节的力量……”^[1]如今,生命与生物、物种及其生产条件均已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筹码一事,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构成史无前例的新局面。

[1] 福柯:《认知的欲望》,页187。(原文没有交代版本情况,该书最早1976年出版于Gallimard出版社,本文引用页码与上述版本相同。译文参照余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余下出自《性经验史》的引文译文均参照该译本。——译注)

* 莫利兹奥·拉札瓦多(Maurizio Lazzarato): 旅法意大利人与独立学者, *Multitudes* 期刊的编委。其研究范围集中在生命政治、后福特主义、社会联结、普遍智能、创新本体与塔德(Gabriel Tarde)社会学等等主题上。其主要著作包括 *Les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s* (《资本主义的革命》[2004年])与 *Puissances de l'invention* (《发明的力量》[2002年])。